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1.016

安乐哲译介《道德经》考论

黄碧蓉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多元文化时期,美国迅速发展成为《道德经》英译重镇,安乐哲与郝大维合译的《道德经》英译本便是其中之典型。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知识结构使其跳出宗教和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局限,他与受过过程哲学教育的郝大维相得益彰,将合作翻译的《道德经》文本置于本原的中国哲学土壤,对其进行中国化的解读。正是得益于道家哲学语境中阐释道家哲学思想,他们能与《道德经》文本视域融合,提出一套他们认为适合中国哲学经典译作的策略性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历史背景说明性序言、哲学导论(即关联宇宙学解释语境说明)、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校对过的中文原文以及与原文相对应的“自觉自明的译文”。“自觉自明的译文”是安郝提出的创新名词,指的是二人回到原典,把文本放置在它本原语境中,抛开汉英词典,在哲学框架下做出的创见性翻译。基于如上策略性创新框架,安郝二人得以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译成他们全新的 21 世纪《道德经》译本。

关键词:安乐哲;郝大维;《道德经》英译;比较哲学;哲学经典诠释框架

中图分类号:B223.1;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1-0086-06

On Roger T. Ame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Tao Te Ching*

HUANG Bi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rapidly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hub in the translation of *Tao Te Ching*, among which the English version co-translated by Roger T. Ames and David L. Hall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Roger T. Ames's knowledge structure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enables him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religion and western philosophical ontology. He brings out the best in David L. Hall, who has received an education of process philosophy, and implants the co-translated text of *Tao Te Ching* on the soil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philosophy for a sinicized interpretation. Thank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aoist philosophy in the context of Taoism, their translating viewsheds are integrated with that of the book and a strategic framework tailored to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is later summarized by them. The framework includes a descriptive preface 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i.e., a contextual explanation of the cosm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 glossary of key philosophical terms, a proofread Chinese text, and a "self-conscious transl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original text. "Self-conscious translation" is an innovative term coined by Roger T. Ames and David L. Hall, referring to putting the text in its original context free from the restriction of th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o as to make a creative translation in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above strategic and innovative framework, Roger T. Ames and David L. Hall are able to make Chinese philosophy speak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finally complete their brand new 21st century translation version of *Tao Te Ching*.

Keywords: Roger T. Ames; David L. Hall;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o Te Ching*; comparative philosophy; th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philosophical classics

一、引言

米切尔·拉法各(Michael Lafargue)和朱丽安·

帕斯(Julian Pas)^[13]以“一瓶精致而神秘的陈年葡萄酒”来比喻《道德经》对西方世界的巨大吸引力。早在 16 世纪,作为道教经典的《道德经》就被译成

收稿日期:2020-10-02

作者简介:黄碧蓉(1970—),女,湖南邵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和翻译研究。

西方文字,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道德经》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到西方世界,成为先秦诸子中翻译最多且影响最大的典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经典名著。

最早的英译本是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的约翰·詹默斯(John Chalmers)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 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 Lau-tsze*)。此后,《道德经》的英译经历了19世纪的传教士翻译时期、20世纪为寻求战后出路而出现的东方智慧典籍热(或曰汉学家)翻译时期,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步入多元文化翻译时期。美国的《道德经》翻译在传教士翻译时期基本缺席,14本英译本只有1本为美国哲学家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一人所译,其余译者均为英国人。在一战后的东方文化热翻译时期,美国人纷纷加入《道德经》翻译,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陈荣捷在其《道德经》英译本“*The Way of Lao Tzu*”(《老子之道》)的序言中提到,从1943至1963年的二十年间,平均每年都有一种新的《道德经》英译本出版,而美国译者的译本占据一半席位。但是,崔玉军^[6]经研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中国学术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更是聊胜于无。”与关注《道德经》的哲学内涵相比,译者们更注重其文本在语言层面的转换。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多元文化时期,由于1973年长沙马王堆新出土帛书《道德经》,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在海外掀起老子研究热、东方文化研究热,《道德经》的复译成为热点。这个时期,美国迅速发展为《道德经》的英译重镇。据辛红娟(2008)的研究统计,在1973至2004年的三十二年间,《道德经》英译本总数78部,而59部集中在美国出版,其余19部发行地较为分散。常青^[5]的研究成果发现,在1973年至2009年的三十七年里,《道德经》英译本中,英国译本19部,而美国译本数量则攀升至88部。与第一时期对《道德经》进行基督教的比附翻译,第二时期追求与原文本的对等翻译相比较,该段时期的《道德经》翻译呈现出典型的文本哲学诠释特征,译者们注意呈现《道德经》作为哲学文本的本原面目。译者在关注《道德经》的语言层面和文学层的传译同时,也较多注重其哲学层面的介绍和评注,安乐哲与郝大维合作翻译的《道德经》英译本“*Dao De Jing " 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 " :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14]便是其中的代表。

米切尔·拉法各和朱丽安·帕斯在他们的《论〈道德经〉翻译》^[13]一文中,以1930年为时间节点,选取1930年至1990年的60年间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十七种英译本为视窗研究《道德经》的英译问题,他们直接略去了1930年之前的传教士英译本,“可能在他们看来,亚瑟·韦利之前的各种译本都属于传教士知识系统,与现代学术背景下的译本不可相提并论,可以忽略不计”^[9]。

安乐哲与郝大维^[1]更是认为,《道德经》作为蕴意深远的哲学经典,其翻译实践却是由传教士和汉学家而非哲学家来完成,哲学家的不在场导致西方思想侵入其中,《道德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因此,本文我们将以第三时期的安乐哲为视点,考察他缘何提出区别于前人的《道德经》哲学翻译策略,他又是在如何在哲学框架下实现他对《道德经》的诠释的。

二、译介《道德经》的知识构架:比较哲学研究背景

安乐哲,1947年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高中毕业后,他远赴美国南加州雷德兰兹(Redlands)大学的文理学院求学。一年后,18岁的他作为交换项目学生被学校派送到香港新亚书院学习一年。研修西方哲学的他由于受到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和劳思光(1927—2012)等几位中国现当代杰出哲学家的影响开始痴迷于儒家的“修身”“弘道”“平天下”的理念,下决心学习中国哲学。次年交换项目结束后他离开香港时,客轮上的他手里还拿着其老师刘殿爵(D.C. Lau, 1921—2010)教授翻译的《道德经》一书。由于“那时整个西方世界找不到教授中国哲学的地方”^[2],为了能够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哲学,他先后辗转到了“台湾大学”哲学系、日本的亚洲研究所、英国的伦敦大学等知名大学研修中国哲学,最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伦敦大学求学期间,他师从学贯中西、当时最受西方尊崇的中国哲学经典翻译家刘殿爵教授,这对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影响甚大。刘教授要求他的学生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时,必须要回到原典,从文本出发进行研究。这深深地影响了安乐哲后来从事的中国典籍翻译,在他与郝大维合作翻译的《道德经》英译本序言里,他们明确阐明了自己复译《道德经》的主要目的:维护《道德经》的本义,还原其本来面目。^{[1]13-14}1978年安乐哲在伦敦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

经刘殿爵教授推荐,于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开启了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夏威夷大学是当时唯一一所开设有中国哲学课程并授予中国哲学博士的西方大学,该学校的哲学系在西方独树一帜,同时期的哈佛、剑桥等著名高校都只将这门学科设置在东亚系或宗教系里。美国第一位华人中国哲学家陈荣捷先生担任第一任系主任。陈荣捷先生坚持认为,西方哲学系研究非西方哲学的学生,要比那些仅限于宗教或亚洲研究领域的学生更具有优势。为了将亚洲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主要思想观念介绍给西方,夏威夷大学哲学系除了开设中国哲学外,还开设有日本哲学、印度哲学、佛教哲学和伊斯兰教哲学课程等东方哲学课程。安乐哲认同这种让学生学习比较哲学的优势,他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优秀哲学思维所需或必需的‘精确性’仅存于西方哲学且在中国传统中缺失,而是因为比较哲学的集成性和扩张性能够提供另一种有利的视角。中国哲学的宏大又能让学生超越西方技术和观念,开阔他们的视野。”^[3]

安乐哲在研究中国哲学时发现,“中文资料库中有一些深刻的‘哲学’文献,如《易经》《论语》《中庸》《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但这类文献并没有被当作哲学来对待。这是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哲学过程中的严重缺陷,这也是推动我与他人合作的动力源。起初是传教士,后来是汉学家在翻译和诠释这些文献。反而,哲学家们只是偶然或浅显地接触中国哲学资料。……对中国文献的非哲学解读无法引起哲学受众的关注,他们也不会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中国文化,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

这样,在夏威夷大学工作不久,安乐哲便通过比较哲学杂志《东西方哲学》的文章了解并结识了他的人生第一个学术研究合作伙伴郝大维(David Hall, 1937—2001)。“我们的合作源于我们的共识,即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方式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如果西方哲学将其他哲学传统排斥在外,那么它作为一门学科就没有尽到学术责任。哲学家的本职工作之一就是识别和描绘人类经验的共同特征,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背景上研究问题。”^[2]郝大维比安乐哲大十岁,是耶鲁大学的博士,经历耶鲁大学和芝加哥神学院的系统学术训练,研究美国哲学,主攻过程哲学,在研究过程哲学时对与过程哲学共通的中国哲学感兴趣。安乐哲与这位对汉字只字不识的西方哲学家合作长达 20 年之久,合著了《孔子哲学思微》《通过孔子而思》《道德经》等 6 部学术专著。

三、译介《道德经》的原则:让中国哲学典籍讲中国话

在安乐哲看来,西方哲学将其他非西方哲学传统排斥在外,认为哲学只不过是盎格鲁-欧罗巴哲学体系。中国哲学由于缺乏向西方哲学介绍自己的哲学家,付出被误读的代价。

“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中国哲学被译成西方语言,一开始就被套上基督教的神学框架,这种‘基督教化’的烙印至今随处可见。”^[4]中国哲学文献基督式的训导和“西方中心论”的痕迹诚如安乐哲所言俯拾皆是,为西方读者所共目。20 世纪 60 年代前,英语世界影响最大的《道德经》的两个英译本,一个是理雅各译本,另一个是亚瑟·韦利译本。前者是西方第一个广泛流传的被作为范本的译本,然而,茱莉亚·哈迪^[11]却对其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理雅各“怀着显而易见的同情心,宣称《道德经》在很多问题是错误的,而基督教经典的论述是对的。他并不是在真正地诠释《道德经》文本,而是简单地以与过去成见相对立的标准来衡量《道德经》”。刘玲娣^[9]经研究发现,截至 1905 年,这种以基督教教义为准绳对《道德经》进行的评判式诠释,在西方世界发行的十三种英译本中基本都存在。亚瑟·韦利的《道德经》英译本在英语世界被公认为优秀的译本,属畅销书,几乎每隔五六年就要重印一次。尽管他自己在其 1934 年出版的《道德经探研:它的意向和力量,以及它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一书的序言中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鸣不平,竭力纠正他之前的《道德经》英译本中存在的基督教化色彩,意欲还原《道德经》之本原面目。但是,由于在“亚瑟·韦利之前,西方人翻译老子绝少参考注解,即使参考,也多重神秘主义浓厚的《河上公注》……西方学者深受其影响。”因此,虽然韦利《道德经》译本的“基督教化的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变,但是笼罩在《道德经》上的神秘主义气息却有增无减”^[9]。这与安乐哲^[2]所总结的一样,“最初,中国哲学文献由于‘基督教化’而为西方读者所熟知,晚近则被套进诗化、神秘化及超自然化的世界观的框架中。”

译者们依赖的重要参考工具书——汉英词典在安乐哲看来,是不可信的。“汉英词典中对于中国哲学词汇有不少译法欠妥,却长期被奉为规范,误导后学。要克服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不准确理解甚至是曲解,就必须准确翻译中国哲学词汇,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4]。

安乐哲认同维特根斯坦之语言的界限就是我

们世界的界限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哲学词汇与西方哲学概念所表达的世界观不一样,用西方哲学概念难以完整表达中国哲学词汇的意义。但是,西方译者往往将最先涌入其脑海的、最符合西方语言习惯的、感觉最舒服的词汇视为最贴切的翻译。而我们的标准汉英词典和术语表恰恰使用的是此类翻译方式。这些词汇的翻译是造成对经典误读的根源。

如,在汉英词典中,“天”这一词条的英文释义有“God”(上帝)、“Heaven”(天堂)和“nature”(自然)。我们知道这三个英文词汇是用于表述上帝这个全知全能的神的专有名词,将中国的“天”等同于西方的“上帝”,用西方的宗教概念来理解中国哲学,这样的翻译会让西方读者觉得中国文化似曾相识,而当西方人把另一种哲学传统误读为自己的传统时,其实也就是用西方的标准在审视异域文化。安乐哲^[2]举例说,亚瑟·韦利在其《道德经》英译本中将“道”译作“the way”,“天”译作“heaven”,“德”译作“virtue”,是给中文强加上与其无关的文化假设的典型例子,是违背中文文本本原意义的。遗憾的是,这些译名已被经典化固化为汉英词典的词条释义中。

在批评中国哲学术语翻译过程中译者们简单、直接地照搬汉英词典释义这一方便但却非常误导读者的错误做法后,安乐哲提出了他自己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的哲学术语翻译原则:“最重要的是厘清两套阐释语境(interpretive contexts)。在恰当的阐释语境下,语言才能较真实地反映思维与文化。我的哲学专著及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副文本(paratext)都在尝试厘清中西两套阐释语境,进而‘解构性’地重新翻译中国哲学术语。”^[8]在《道德经》翻译时,他采取的具体做法是:在译文开始前的哲学术语词汇表“Glossary of Key Terms”部分(即安乐哲讲的副文本),他首先将这些术语直接罗马字母化进行音译处理,他将“气”译作“qi”,“心”译作“xin”,“和”译作“he”,“明”译作“ming”,“静”译作“jing”等,他说他以这种直观的异语书写形式“提醒读者他们正进入一个陌生的哲学世界”,然后他详细地介绍每一个术语在中国传统语境下所蕴含的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意义内涵。对于上述“天”这一哲学术语,他尤为慎重,在将其音译为“tian”之后,花了将近3页的篇幅解释说明自己选择音译这种“零翻译”(“we choose not to translate”)而不是传统的“Heaven”译法是为了避免读者引发该词源于亚伯拉罕传统的误导性联想,安乐哲说自己“必须把这个词从这些使人误解的联想中解脱出来”,他接

着详细阐述中国传统语境下何为“天”(“what is tian”),以及自己在《道德经》相关章节中将“天道”“天命”“天地”“天人合一”等所做的相应翻译处理。^{[14]:49-51}

四、译介《道德经》的策略:新的哲学经典诠释框架

安乐哲^[2]发现,现存的翻译模式是建立在使用标准汉英词典和默认一个未经反思的假定的基础上的,这个假定就是“字面的”翻译必定是准确的。但这种翻译模式和未经反思的假定导致了文化的模糊表达。他认为,基于这套模式的翻译实际上已经走得太远,有意无意地将一个文本从其历史和人文背景中剥离出来,移植到一片哲学水土完全不同的土地中,这是在任意利用该文本,并且完全不在意篡改其根本。

基于此,他与翻译合作伙伴提出一种新的诠释策略,搭建起一套他们认为适合中国哲学经典传译的策略性框架,框架包括用于背景解读的阐释性序言、哲学导论、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校对过的中文原文、以及与原文相对应的自觉自明的译文。对于“自觉自明的译文”,安乐哲^[2]着重解释道:说我们的译文是“自觉自明”的,绝不是指我们的规则已被广泛承认,也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字面的阐释。但是,我们认为坚持要求译文要完全忠实原文不仅是无知的,而且其自身首先是一种文化偏见。从一开始,我们就认定作为翻译的目标语言的英语自身附着着诠释性的重担。由于缺乏充分的背景介绍和术语表,中国典籍的哲学内涵在翻译过程中被大打了折扣。进一步说,由于缺乏自觉自明意识,翻译者不能意识到他们自身伽德玛式的偏见,所以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所谓“客观的”辞典。但事实是,辞典自身就渲染着严重文化偏见的油彩。可见这种译文不是背叛了他们的读者一次,而是两次。

可以看出,安乐哲所说的“自觉自明的译文”,指的是他和合作伙伴回到原典,把文本放置在它本来自有的土壤中,从文本出发,抛开汉英词典,在哲学框架下匡正以往误译,给出他们自己有创见的翻译。

《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归为一个“道”字。《道德经》八十一章中有三十七章是谈论“道”的,“道”一共出现74次,关于“道”的阐释是整部经典之核心。下面我们以“道”这个核心词汇的翻译为例,探讨安郝《道德经》译本的哲学诠释进路。

安乐哲与郝大维从后者擅长的过程哲学视角解读《道德经》文本。他们^[116]认为:《道德经》里的

‘万物’是生动的‘过程’和进行的‘现象’,由此那些有可能将这个世界‘客体化’的名词就会生出或转化出动词感”。为传译《道德经》中这种“过程”或动态,安郝使用他们独创的将名词转化为动名词的创造性翻译策略。

我们结合上文提到的两个经典英译本——理雅各译本(以下简称“理译”)和韦利译本(以下简称“韦译”),对比分析安郝译本(以下简称“安郝译”)对“道”的阐释。

《道德经》开篇即是对“道”的论述: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第一章)

理译(1962)^[12]:“The Tao that can be trodden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Tao.”

韦译(1988)^[15]:“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安郝译(2003)^[14]:“Way-making (dao) that can be put into words is not really way-making.”

对于“道”,理译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基督教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理解为上帝之“道”,然后对《道德经》展开阐释。他采用异化翻译法,为了保留原语的语言特征,他使用威妥玛拼音,通过将首字母大写的方式把“道”处理为一个专门术语。这种直译异质文化的处理方法简则简矣,却给译语读者带来了隔膜。

韦译使用“the Way”翻译“道”,通过将“way”这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使它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浓厚的基督教文化气息跃然纸上。《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John 14: 6)中这样记述:

“Jesus said to him,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可见,基督教中的上帝是道路、真理、生命,“the way”是通往上帝天国之门的“道路与方法”,是上帝的特征之一。^[10]

在中国的哲学和传统中找不到上帝的概念,儒释道共同的自然宇宙观认为“人”为“道”的一部分,“老子第一个将‘道’提升到哲学的最高范畴”^[7],老子的“道”更关乎天道、地道、人道和王道,“道”具有创生之力,生生不息,且无处不在。韦译用“the Way”这一“上帝之道”来诠释老子之“道”,给老学披上西方神学的外衣,让西方读者误以为《道德经》是神存在的佐证,这极大地曲解了老子的思想。

安郝译中,“道”被翻译为“way-making”。如前所述安郝在他们的《道德经》译本^[14]⁴⁵译文开始之

前特别安排了“关键术语词汇表”(Glossary of Key Terms),在词汇表中二位译者对“道”进行了详细阐述。他们从词源学视角解释了自己使用“way-making”来传译“道”的原因。“道”这个字,由“足”和“首”两部分构成,该字于“造字之初就带有动名词性、过程性和动态性”,具体于《道德经》中,体现在“‘道’作为延展着的性状或倾向存在基本的‘动力感’”,以及“人类在行路途中(making our way)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因此,“道”具有“移动性”和“未然性”的特质,是一个不断发现机会(trigger)的辟路前行(way-making)。因此,可以看出,安郝使用动名词的“way-making”而非名词的“way”是在领悟了老子的“道”的过程性特征而做的正确阐释。

《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搏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微,其下不忽,绳绳兮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释义:看它看不见,把它叫做“微”;听它听不到,把它叫做“希”;摸它摸不到,把它叫做“夷”。这三者的形状无从追究,它们原本就浑然而为一。它的上面既不显得光明亮堂;它的下面也不显得阴暗晦涩,无头无绪、延绵不绝却又不可称名,一切运动都又回复到无形无象的状态。这就是没有形状的形状,不见物体的形象,这就是“惚恍”。迎着它,看不见它的前头,跟着它,也看不见它的后头。把握着早已存在的“道”,来驾驭现实存在的具体事物。能认识、了解宇宙的初始,这就叫做认识“道”的规律。)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了“道”的开放性性质:无形无象,但的确存在,万物皆由它生发。安郝^[14]⁷⁰通过使用一系列动名词(looking, seeing, listening, hearing, groping, getting, dazzling, following, way-making, happening, drawstring)对应转译了“道”的这种生生不息和无处不在的活力。同时,他们还在译文后的评注(Commentary)部分运用互文法借助《论语》文本中孔子弟子颜回追随孔子二十年后所说的一番话对“道”做出注释:“也许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章最具启发性的注脚之一是《论语》第九章的第十一节。这一节说的是孔子最优秀、最聪明的弟子谈及自己接受孔子教育时的感受。对颜回来说,前行的道路也是一种延续性与不确定性。”接着安郝附上《论语》这一节的引文,“颜渊感叹着说:“老师之道,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努力钻研,越觉得深。看着,似乎在前面,忽然又到后面去了。老师善于有步骤

地引导我,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又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的行为,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我已经用尽了我的才力,似乎能够独立地工作。想要追随上去时,却找不到可循的路径了。”注释最后,安郝总结说,“颜回是针对人类社会的礼制教育而展开的对‘道’的反思,与之相比,《道德经》的适用范围更具明显的宇宙性。”

《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说“道”,后四十四章论“德”。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之本原,“德”的内容由“道”决定,“道”的属性表现为“德”的观点,“道”的这些性质问题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德经》里有多章是论述道的性质问题的重要篇章,包括第一章、第四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五章。相应地,安郝在翻译这些章节时,倾力从哲学视角进行解读和翻译,以达成对“道”的跨语哲学传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每一章的评注部分还给出详尽的哲学知识阐释。我们发现,安郝长于运用互文法阐释“道”,除了上文提到的在第二十一章的评注中他们使用自己翻译过的《论语》片段阐发“道”之高远,在第二十五章,安郝在翻译老子描述“道”作为一个绝对体而存在、以独立而不改的运动方式在运行的文字时,在注释中他们再一次借助自己熟悉的《易经》文本内容(“自然的变化性,即‘变’,和连续性,即‘通’,这一过程犹如四季的交替变化。”)来解释“道”之永恒:“在易经中,这种连续性和离散性共存的感觉就跟变化着的四季一样,每个季节各不相同但又彼此接续。”

五、结语

中国哲学在西方的长期“失语”,安乐哲认为要

归罪于“背叛读者两次”的翻译”。由于哲学家的缺席,以传教士和汉学家们为主体的翻译让《道德经》一直在说着不属于自己的语言,让老学在误读误释中披着神学的外衣。

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知识结构让其跳出了宗教和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局限,他选择和主攻过程哲学的郝大维一起重译《道德经》,以匡正谬译,还原《道德经》作为哲学经典的本真蕴意。他们将《道德经》文本置于自身本原土壤,对《道德经》文本进行中国化的解读。正是在道家哲学语境中阐释道家哲学思想,让安乐哲与郝大维能与《道德经》文本视域融合,从而产生了他们全新的21世纪的《道德经》译本。

安乐哲与郝大维合译的《道德经》英译本,正如其书名所言:“*Dao de jing: 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开启了《道德经》的哲学诠释全新阶段,使中国2500多年的老子思想走出了因哲学家缺位而被误读误释的翻译阴霾。受安乐哲影响,美国学者Grossman于2007年亦从哲学视角翻译出版了他的《道德经》英译本:“*The tao of Emerson: the wisdom of the tao te ching as found in the words of Ralph Waldo Emerson*”,他使用将老子玄学与美国先验论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哲学思想进行相互比照的方式来翻译《道德经》,以此向西方读者诠释老子深奥的哲理智慧。^[16]当然,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典籍在历经160年西游后回归其本原的哲学面目还任重道远,希望有更多的国内外学人特别是哲学界的学者加入《道德经》的翻译,使《道德经》绽放出其应有的哲学智慧光彩。

参考文献:

- [1] 安乐哲,郝大维.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M].何金俐,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 [2] 安乐哲.我的哲学之路[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6(6):14-17.
- [3] 安乐哲.活着的中国哲学[J].孔学堂,2015(1):78-84.
- [4] 安乐哲,田辰山.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N].人民日报,2015-08-10(016).
- [5] 常青.《道德经》在英美的复译与嬗变[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3):48-54.
- [6] 崔玉军.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2005(4):42-50.
- [7]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8] 郭薇,辛红娟.外语与外语教学[J],2020(5):139-147.
- [9] 刘玲娣.陈荣捷与《道德经》英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136-149.
- [10] 王冰,郭放.“道”与“the Way”——关于“道”的英译[J].考试周刊,2011(15):20-21.
- [11] HARDY J M. Influential West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ao-te-ching, Lat-tzu and the Tao-te-ching [C]// KOHN L, LAFARGUE M,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165-188.
- [12] LEGGE J. The Texts of Taoism [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1962.

与外部环境合力,推动大学英语教学形成外向型生态体系。首先,重新激活家庭的教育功能。对此家长首先要转变自身教育观念,重视自身素养提升对学生的教育引领作用。家长应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关注学生思想、情感与精神动向,以此提升学生对家庭等依恋度,进一步强化家庭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在家庭教育功能回归与强化的同时,学校应正确认识家庭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价值,提升自身家校合作专业知识与能力,以此

引导家长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功能,构建有效的家校合作生态体系。其次,充分发挥社会环境的协同作用。教育生态学视角下大学英语教学体系应体现多样性与开放性,实施开放办学,联通内部与外部环境,加强教学内部环境对社会外部环境的适应力,以此提升其整体的社会竞争力。如“政产学研用”理念的提出,即是教育与政治、产业、科研及用户多个体系联合在一起,多方共建,优化教育生态体系。

参考文献:

- [1] 胡芳毅,王宏军.从“任务链”到“生态圈”:大学英语教学的生态建构[J].外语教学,2019(2):76-79.
- [2] 李晨,陈坚林.大学英语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生态位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7(5):15-22.
- [3] 田成泉,郭坤.教育生态学视角下大学英语教学环境的优化研究[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7(3):1-4.
- [4] 梅翠平.生态化教育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师身份的建构[J].外国语文,2020(4):137-144.
- [5] 陈蔚,杨跃.大数据环境下大学英语教育生态环境构建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67-171.
- [6] 姚芬.生态学视阈下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学生生态位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9:81.
- [7] 黄莹雪.基于教育生态学的“3+2+4”跨文化英语教学模式——以某高职院校为例[D].武汉:武汉科技大学,2018:86.
- [8] 肖筱.教育生态学视角下大学英语生态课堂的优化策略研究——以湖北省三所独立学院为例[D].荆州:长江大学,2016:74.

(上接第91页)

- [13] LAFARGUE M, PAS J. On Translating of Tao-te-ching,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C]. // KOHN L, LAFARGUE M.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277-301.
- [14] AMES R T, HALL D L. Dao de jing: 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Ballantine Books, 2003.
- [15] WALEY A. The Way and Its Power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M].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88.
- [16] GROSSMAN R. The Tao of Emerson: the Wisdom of the Tao te ching As Found in the Words of Ralph Waldo Emerson[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7.